

顧頡剛創辦《禹貢》半月刊的學術啟示

張耀銘

[提要] 歷史學家顧頡剛於1930年代創辦的《禹貢》半月刊 (*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是中國第一份專門研究“歷史地理”的學術期刊。《禹貢》在學術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也給當下學術期刊主編諸多的有益啟示：一是研編並舉，互為促進；二是長袖善舞，廣結人脈；三是扶植新人，造就新人；四是無間新舊，兼容並包；五是引領學術，創建學派；六是經世致用，學術救國。

[關鍵詞] 顧頡剛 禹貢學會 《禹貢》半月刊 歷史地理 學術啟示

[中圖分類號] G239.2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4)01-0104-09

民國不是一個好的時代，但卻是一個色彩斑斕的時代，是一個“新學和舊學碰撞，中學和西學融匯”^①的混沌時代。民國時期很多知識分子特立獨行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氣質，被當下部分文人稱之為“民國範兒”，作為一種趣味、一種風尚、一種美學在談論。的確，文化是要有一個生態的。民國初期，教育比清朝獨立，新聞出版比清朝自由，知識分子非常活躍。所以，“民國的藝術與學術，基本還保留了精神的多樣性，使得各類人物有了馳騁的機會。超人的激情與禪林之風，左翼鬥士與自由主義紳士，托派與安那其主義，遺老和西崽，演繹了諸多的故事。”^②民國時代，名師輩出、群星璀璨：文學方面有文言派的黃侃、劉師培、陳介石等，白話派的有胡適、陳獨秀、劉半農、周樹人、周作人等；史學方面有信古派的陳漢章、柳詒徵、劉澹藜等，有疑古派的錢玄同、沈尹默、顧頡剛等；社會科學方面有馬寅初、陶履恭、王星拱、陳大齊、趙元任、何廉、蕭友梅，自然科學方面有李四光、翁文灝、丁文江、任鴻雋；在對待文化思想的態度方面，有提倡新文化的陳獨秀、李大釗、胡適，也有保守派的辜鴻銘、吳宓、梁漱溟。其時文人辦刊已成風氣，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周作人、魯迅、張東蓀、傅斯年、胡漢民、戴傳賢、郭沫若、林語堂、鄭振鐸、馮至、高長虹都曾借期刊一試身手、登高一鳴。影響力較大者有北京的《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努力週報》，以及上海的《解放與改造》、《建設》、《星期評論》等。

“史學是當時人文學術研究的總樞紐，一端集舊學之大成，一端啟新學之門徑”，^③史學界湧現出了一批大師級的學者，如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陳垣、胡適、顧頡剛、傅斯年、呂思

勉、徐中舒、蒙文通、柳詒徵、董作賓等，他們以淵深的國學根底，融通中西，不僅開創了學術研究的新領域，更展現了極富個性的治學方法與學術風範。20世紀20年代史學期刊開始興辦，發展至30年代逐步成熟。學者們通過史學期刊這一媒介討論問題，形成思潮，繼而發展成為學派。

“如《史地學報》、《史學與地學》、《史學雜誌》、《史地雜誌》與史地學派的形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與史料學派的產生，《禹貢》半月刊與歷史地理研究的興起，《食貨》半月刊與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勃興，都是其突出的代表。”^④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顧頡剛創辦的《禹貢》半月刊，她不僅記錄了社會時事的改變，同時也成為推動這些改變的工具，在學術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並且也給當下學術期刊主編諸多的有益啟示。

啟示之一：研編並舉，互為促進。

顧頡剛（1893～1980），江蘇吳縣人，1913年就讀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北大本科，原傾心於章太炎的學問，後與同學傅斯年雙雙轉至胡適門下。1920年顧頡剛畢業之際，羅家倫在致胡適的信中說：“頡剛的舊學根底，和他的忍耐心與人格，都是孟真和我平素極佩服的。所以使他有個做書的機會，其結果決不只完成他個人求學的志願，而且可以為中國的舊學找出一部分條理來。”^⑤胡適不負羅家倫之託，為顧頡剛謀取了北大圖書館的職事。由於圖書館的薪酬較低，入不敷出，顧頡剛又求助於胡適。胡適讓他標點《古今偽書考》，得到一些報酬。顧頡剛利用圖書館豐富的藏書，鉤沉索引，考鏡源流，探幽發微。他在研究中發現：中國古史裡裹藏著許多偶像，帝系所代表的是種族的偶像，王制所代表的是政治的偶像，道統所代表的是倫理的偶像，經學所代表的是學術的偶像。這些封建偶像支配著中國的古史。因此，為了建設真實的、科學的古史體系，必須徹底摧毀這些偶像。1923年，顧頡剛在《讀書雜誌》第九期發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第一次公開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他認為中國傳說的古史系統，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由不同的時代“層累式的造成的”。他把這個基本的古史觀的思想內涵及歷史演化歸結為三個方面。第一，“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時期愈長”。例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聖賢是禹，到了孔子時代出現了堯舜，及至戰國時代又出現了黃帝、神農，到了秦代又出現了“三皇”，到了漢代以後則出現了“盤古”；第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例如，舜，在孔子時代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了《堯典》就成了“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了孟子時代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第三，我們即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最早的狀況。例如，我們即使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使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這個“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的歷史觀的核心思想是：承認傳說的古史並非自古皆然，而是由無到有，由簡單到複雜，逐漸演化而成，這既是偽造傳說古史的過程，也是傳說古史由簡單到複雜的演化過程。^⑥顧頡剛以疑古辨偽的態度考察了孔子與六經的關係，斷定六經決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經沒有太大的信史價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經編成的整個古史系統。這如同在史學界引爆了一個炸彈，一時間眾說紛紜，批評者眾多。在這關鍵時刻，胡適撰文支持顧頡剛。1924年2月，胡適在《讀書雜誌》發表《古史討論讀後感》一文，胡適稱，“顧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見解真是近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並認為“一個中心學說已替中國史學界開了一個新紀元。”胡適的話一出，無疑為顧頡剛在史學界贏得一定地位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26年，由顧頡剛編著的《古史辨》第一冊出版，再次轟動史學界，胡適稱之為“中國史學界的一部革命的書，又是一部討論史學方法的書。”從1926年到1941年《古史辨》論叢共出版七大

冊，其中一、二、三、五冊為顧頡剛編著，四、六冊由羅根澤編著，七冊上中下三編由呂思勉、童書業編著。古史辨學派的誕生，《古史辨》論叢的出版，無疑是20世紀中國所發生的最為重大的學術史事件之一，意味著源遠流長的中國上古史知識框架已經崩潰，從而開闢了中國史研究的新局面。

民國時代，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刊物創辦者往往兼有大學教授的身份。而且不單教授們在辦刊物，許多有抱負的學生也都在創辦刊物。“大學與刊物結合，使民初思想界呈現出有別於晚清的圖景。”^⑦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雜誌，最初匯聚的主要是安徽籍的讀書人，影響有限。1917年出現了一個重大的歷史機遇，蔡元培先生誠邀陳獨秀帶著《新青年》走進北大，並讓其當上了文科學長。由此，刊物的“撰稿人則幾盡是北大的教員和學生，《新青年》迅即成為北大革新力量的言論陣地”。^⑧胡適、錢玄同、高一涵、李大釗、劉半農、周氏兄弟、沈尹默、陶孟和等，一時成為刊物的主要角色。有了《新青年》與北大的結合，也就有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顧頡剛深受北大傳統與文化的影響，在任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雲南大學、齊魯大學、復旦大學、蘭州大學教授時，先後創辦了《國學季刊》、《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週刊》、《民俗週刊》、《燕京學報》、《禹貢》、《邊疆週刊》、《齊魯大學國學季刊》等學術期刊。那時，“學者學有所得，常即發為演講，布諸雜誌，以相討論，以求增益。一二年所得，罕有刊成書冊者。治一學，而欲知新，而欲與時皆進，乃非讀其學之雜誌不可。”^⑨大學教授投稿報刊，已然成為一種生活形態。顧頡剛抓住契機創辦刊物，充分發揮學術合作、學術交流平台的作用，並搭建起溝通社會的橋樑。顧頡剛創辦刊物，優勢有四：一是作為教授，他的周圍聚集著一些學術團體和學生隊伍，可以保證刊物的稿源和質量；二是他有很高的學術水平，對所從事研究領域的發展現狀及學術前沿、發展趨勢有清楚的認知，可以敏銳判斷學術的創新點和突破點；三是他是知名學者，在學術界有一定影響，能夠提升學術期刊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四是他有寫稿、投稿的經歷，其中甘苦自知，因此在編輯中所透析與發散出來的那種難以割捨的和一以貫之的人文情懷，催人思考，亦感人至深。

反傳統的人其實是站在傳統的基點開始起航的。顧頡剛深味傳統的弊端，才有了摧枯拉朽的渴望。他教書育人、鑽研學問、創辦刊物一身三任，目標迥異，但卻成績斐然，充分顯示了作為優秀史家的互為補充、互為促進的功力之長，由此奠定了他“大師級”的歷史地位。

啟示之二：長袖善舞，廣結人脈。

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領域內，胡適的兩位弟子傅斯年和顧頡剛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在學識、才幹等方面勢均力敵，堪稱為兩種不同又彼此無法取代的學術組織模式的代表。傅斯年（1895～1950）的事業具有官方色彩，他與蔡元培、朱家驊、胡適等人交往密切，“一手抓住美庚款，一手抓住英庚款，再加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掌門人這個職位，擁有旁人難以企及的豐厚學術資源，已足以做到呼風喚雨、號令天下的地步。”^⑩顧頡剛的“學術思潮”具有民間色彩，他靠創立現代史學新範式的學說崛起於學術界，事業鼎盛時居然身兼數職：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主任、禹貢學會及其半月刊主持人、通俗讀物編刊社負責人等。1936年，為了到北平研究院上班和應酬方便，他購置舊汽車一輛，這在北平學界是絕無僅有的，因此招致許多人的嫉妒和反對。正因為傅斯年與顧頡剛在學術社群中扮演的不同角色類型，最終導致他們由“同門弟子”走向了“鬩牆之爭”，二人之間的關係也成為一個長久不衰的熱點話題。其實，一個學派的生存延續，一個導師的同門弟子，不都是一種色調，同門學生的差異性，

其實也豐富了學術的內涵。如章太炎的學生中，既有狂放不羈的，也有書齋氣十足的，他們跟隨老師讀書，得其一點而大加發揮，遂成學界一家，足以令人嘆為觀止。

顧頡剛曾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說：“如果我們要求真知，我們便不能不離開了人生的約束而前進。所以在應用上雖是該作有用與無用的區別，但在學問上則只當問真不真，不當問用不用。學問固然可以應用，但應用只是學問的自然結果，而不是著手做學問時的目的。”不少學者據此認為顧頡剛抱有“學術至上”的觀念，是固守在“象牙塔”裡死讀書的學究，其實這是一種誤讀。余英時通過對《顧頡剛日記》的研究，發現“他的‘事業心’竟在‘求知欲’之上，而且從1930年代開始，他的生命形態也愈來愈接近一位事業取向的社會活動家，流轉於學、政、商三界。”^⑩顧頡剛交遊之廣，當時學界中人罕有其匹，不僅有青年學生、中外教授、社會名流，還有商界領袖、蒙古王公、地方大員、黨國要人。這些人脈關係，這些交際活動，無疑給他的事業帶來很多好處。

禹貢學會成立之初，學會的籌備處和刊物編輯部就設在顧頡剛的家中，顧頡剛、譚其驥負責內容，顧頡剛女兒顧自明擔任發行，“經費主要靠顧、譚月捐二十元，有時捐四十元維持；一部分來自會費：他們廣泛邀約班上的學生及平、津、滬、甯、杭、穗等地的熟人參加學會，普通會員每月收費一元，學生會員收五角。刊物不設稿酬，寫稿、審稿、編輯和全部工作都是義務的。”^⑪為了改變這種捉襟見肘的辦刊狀況，顧頡剛多方遊說教育部長王世傑、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交通部長朱家驊、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等，爭取提供經費，並主動拜訪中英庚款董事會、中山文化教育館、民間出版商和書店，謀集資金支持，從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禹貢學會調查邊疆現狀、研究邊疆歷史、出版邊疆叢書得以實現。由此我們得到一點有益的啟示：在推動學術發展的進程中，並非只有作者、學者是主動的，刊物同樣也可以是主動的，而編輯在社會與學者之間扮演的中介作用不能忽視，尤其是那些具有專業背景、博學多識、人脈資源豐富、社會活動能力強的名主編在學術史上發揮的作用更為突出。

啟示之三：扶植新人，造就新人。

1929年夏，顧頡剛自廣州北上赴燕京大學任教，途經蘇州時結識了僅為中學畢業的錢穆。錢穆把寫好的《劉向歆父子年譜》交給顧頡剛，文稿以堅實的證據批駁了上至廖平、康有為，下迄顧頡剛、錢玄同等人論述的牽強武斷，認為康有為所主張的劉歆偽造諸經之說不能成立，對當時流行的現代疑古思潮發出詰難。顧頡剛不以學歷論高低，不介意對自己的批評，反而將這篇文章發表在自己主編的《燕京學報》第7期（1930年6月出版）上，後又編入《古史辨》第五冊中。文章出版之後，震驚北京學術界，錢穆由此名聲大噪。顧頡剛遂推薦錢穆先在燕京大學任國文系講師，後轉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開設中國上古史、秦漢史等課，講授史學，終成一家之言。晚年的錢穆回憶時還感嘆：《劉向歆父子年譜》“不啻特與頡剛爭議。頡剛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薦至燕京任教。此種胸懷，尤為余特所欣賞。固非專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⑫

童書業連中學都沒上過，卻記憶力驚人，酷愛文史，以熟悉歷史資料見長。他沿著顧頡剛疑古辨偽的思路，寫出《禮記考》和《虞書疏證》。顧頡剛為他的學識震驚，便請他做自己的助手。1935年6月，童書業應約抵達北平時，顧頡剛親赴車站迎接，並讓童書業擔任自己在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教授“春秋史”課的助教，薪金由顧頡剛自己支付，食宿也在顧頡剛的家裡。此後，童書業不僅主編了《古史辨》第七冊，還與顧頡剛合寫了《夏史三論》，對“古史辨派”做出了重要貢獻。

1935年3月28日，顧頡剛在致譚其驥的信中明確表達：“我辦這刊物，固要使你成名，但世界上埋沒了的人才何限，可以造就的青年又何限，我們縱不能博施濟眾，但必應就力之所及，提拔幾個，才無負於天之生才。例如鍾風年先生，年逾五十，以十餘年之精力費於《戰國策》上，然而世上有什麼人知道他？因為世人不知，而他的文字又不足以表達學問，以致困頓不堪，不能給衣食。此等人我不幫他一下，再有什麼人幫他？又如孫海波君，其學力為世所希見，而其文字頗有疵類，不為他改竟不能登。難道我為了愛惜自己的時間而使他失去了發展的機會嗎？又如馬培棠君，有學問，有見解，又會寫文章，這種人是很能脫穎而出的，但因他寡交遊，沒有人為他揄揚，就埋沒在一個中學校裡。現在我們常登他的文章，竟使注意他的人愈來愈多，我到南到北都聽見提起他的姓名了，又有人托我介紹和他通信了。這樣地使許多有志有為的人都得到他的適當的名譽和地位，豈不是人生一樂？所以我們若為自己成名計，自可專做文章，不辦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與國家社會之不愛重人才，而欲彌補這個缺憾，我們便不得不辦刊物。我們不能單為自己打算，而要為某一項學術的全部打算。”^⑭顧頡剛的這種操守和格調，曾經鼓舞過一代又一代後學，也充分證明：一本刊物的不朽和成功，不僅在於她能團結和吸引多少名家，更在於她能發現、扶植和造就多少新人。

啟示之四：無間新舊，兼容並包。

1932年，顧頡剛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開設“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課程，專講《禹貢》。1934年2月4日，“禹貢學會籌備處”成立。同年3月1日，《禹貢》半月刊正式出版，由顧頡剛、譚其驥（後為馮家升）任主編。1936年5月24日，禹貢學會在燕京大學正式成立，選顧頡剛、錢穆、馮家升、譚其驥、唐蘭、王庸、徐炳昶七人為理事，劉節、黃文弼、張星烺三人為候補理事；選于省吾、容庚、洪業、張國淦、李書華五人為監事，顧廷龍、朱士嘉二人為候補監事；並通過了學會章程。《禹貢》半月刊共出版了7卷82期，至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被迫停刊。在短短三年多時間中，禹貢學會聯絡組織志同道合的學者，做了大量歷史地理研究工作。《禹貢》半月刊作為學會的學術刊物，共刊登了300餘位作者的700餘篇文章^⑮，在海內外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禹貢》半月刊作為學術研究的重要平台和中介，顧頡剛在“發刊詞”、“紀念辭”中多次強調：“我們無間新舊，兼容並包，使得偏舊的人也薰陶於新方法的訓練，而偏新的人也有舊材料可整理，他們有相互的觀摩和補益而沒有相互的隔膜和衝突。我們常有劇烈的爭辯，但這爭辯並不是有所挾持以凌人，而是把自己搜集來的材料和蘊蓄著的意見貢獻出來，共同討論一個問題，尋求適當的解決。”^⑯顧頡剛不僅這樣說，而且身體力行。他倡導學術爭鳴，更歡迎學術批評。例如，他曾經認為“禹是蜥蜴”一類的蟲，經人指出謬誤後，立即放棄。他也曾提出對夏史的懷疑，但一旦聽說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後，便馬上認為：“說不定是夏代物”，並指出“河、洛之間為夏代政治中心”。^⑰傅斯年在《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上發表了《夷夏東西說》，認為夷夏對立，夷在東方，而夏在西方。楊向奎不同意這種說法，寫了《夏代地理小記》反駁，認為夏起於東方，夏中葉之前活動的中心以山東地區為主，後來向西邊的山西等地發展。楊向奎把文章交給傅斯年看，傅斯年不同意楊向奎的觀點，看後退還了論文。楊向奎便把文章交給了老師顧頡剛。一位權威教授，一個二年級學生，並不勢均力敵的對手，但顧頡剛卻能平等對待。他把楊向奎的文章發表於1935年出版的《禹貢》雜誌1卷1期。楊向奎得到激勵，繼而向老師顧頡剛發起挑戰。顧頡剛曾斷言《周禮》與《左傳》這兩部古文經書，都是西漢末年劉歆偽

造之書。楊向奎經過多方稽考，撰寫了《論〈左傳〉的性質及其與〈國語〉的關係》，發表於1936年出刊的《史學集刊》第2期上，確認《周禮》與《左傳》二書都不是偽作。顧頡剛以“古史辨”鳴世，他的得意弟子卻在做著顛覆導師的工作，令學人大開眼界。

民國學人的豪情、膽氣、文采、激進，是當時文化的一道景觀。《禹貢》半月刊刊載的爭論文章中，不僅有著名學者之間的學術切磋，也有青年學者對學術權威觀點的挑戰，更有不同學派“對手”之間的爭鳴。劉掞藜（1899~1935）作為“信古派”代表、“南高史地學派”幹將，以《史地學報》為主要陣地，與顧頡剛倡導的疑古思潮開展論戰，僅在1924年就先後發表《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與顧頡剛討論古史第二書》、《與顧頡剛先生書》、《與顧頡剛先生書（三續）》等多篇文章予以批評，那份咄咄逼人，每每聳動天下。顧頡剛對劉掞藜文，既有反駁，又有肯定，體現了以理服人的學術精神。劉掞藜36歲早早離世，讓人無限感傷。為紀念這位“有志之士”，顧頡剛在《禹貢》半月刊發表了他的論文《晉惠帝時代漢族之大流徙》，並加“按語”寄託哀思：“我想我們總有握手的一天，我想將來我們該再來打古史的官司，直到把我們心頭的問題打出一個結果為止，哪知道到了現在只斷定是一個虛願呢！”從中顯示了他的情感暖意和思考觀察，在徐緩從容中可見波瀾和洞見。青年學者張蔭麟（1905~1942）1925年4月在《學衡》第40期發文《評近人對於中國古史之討論》，激烈批評顧頡剛誤用默證方法，給史學研究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顧頡剛沒有直接反駁這位青年學子，但卻把其文章收錄於《古史辨》第二冊，以供學界和讀者閱讀欣賞、辨別是非。1941年張蔭麟出版《中國史綱》，“改變了信古的初衷，思想認識向顧頡剛靠近”，“符從了顧頡剛的理念。”^⑩最早提攜張蔭麟的“學衡派”創始人吳宓對《中國史綱》極為不滿，批評說：“宓素以蔭麟為第二梁任公，愛其博雅能文，而惜其晚歲《中國史綱》之作，創為新體，未免誤入歧路。”^⑪1945年顧頡剛出版《當代中國史學》，將張蔭麟《中國史綱》與錢穆《國史大綱》、呂思勉《中國通史》、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陳恭祿《中國史》、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等著作並列，讚揚是當代“較近理想的通史”^⑫，而此時距張蔭麟去世已近三年，尤其令人感動。學問可以靠努力為之，而人生境界，僅靠讀書恐怕是得不到的。

啟示之五：引領學術，創建學派。

1934年2月，顧頡剛正式邀請譚其驤共同發起籌組禹貢學會，創辦《禹貢》半月刊為學會的會刊，並商定以北大、燕大、輔仁“三校學生為基本成員，並以學生們的習作為主要稿源。”^⑬顧頡剛常出題目、提供資料、教導方法，讓學生寫成文章，再提修改意見，或者親自補充潤色，仍用學生的名字在《禹貢》發表，意在培養一批人才。史念海就利用乾嘉學術方法，撰寫了《兩漢郡國縣邑增損表》、《兩唐書地理志互勘》、《兩漢侯國考》等論文，受到顧頡剛的欣賞，發表在《禹貢》半月刊上。1937年，年僅25歲的史念海就與顧頡剛合著了《中國疆域沿革史》，成為我國沿革地理學中最重要的著作。侯仁之大學畢業就參與了《禹貢》的編輯工作，顧頡剛讓他邊工作邊習作，還特地為他擬定了寫作題目《漢書地理志中所釋之職方山川澤寢》，這篇習作很快就在《禹貢》半月刊登載出來。後來侯仁之回憶：“尤其使我驚異的是這篇文章的緒論和結語，都經過了頡剛老師的修改、補充和潤飾，竟使我難於辨認是我自己的寫作了。這件事大大激勵了我，我決心去專研古籍，就是從這時開始的。”^⑭

《禹貢》半月刊出版之後，顧頡剛又廣泛邀約平、津、滬、甯、杭、穗等地的熟人參加學會，他“希望能聚集若干肯作苦工的人，窮年累月去專研，用平凡的力量，合作的精神，來造

成偉大的事業，因為惟有這樣才有切實的結果，正如磚石建築勝於蜃氣樓臺。我們確實承認，在這個團體中的個人是平等的，我們的團體和其他的團體也是平等的。我們大家站在學術之神的前面，為她而工作，而辯論，而慶賀新境界的開展，而糾正自己一時的錯誤。我們絕對不需要‘是丹非素’的成見，更無所謂‘獨樹一幟’的噓聲。”^②顧頤剛海納百川、兼收並蓄的胸懷和氣度，吸引了更多的學者，聚集在“禹貢學會”的周圍，如譚其驤、錢穆、馮家升、翁獨健、唐蘭、王庸、徐炳昶、劉節、黃文弼、張星烺、梁思懿、鄭德坤、朱士嘉、張維華、顧廷龍、段承澤、薛文波、王守真、陳增敏、楊向奎、侯仁之、史念海、童書業等，形成了日本學者森鹿三稱之為“禹貢學派”的強大學術陣容。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中的大家名家全部出自顧氏家門（楊向奎語）。並稱為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三駕馬車”的譚其驤、侯仁之和史念海，都曾是顧頤剛的學生。無論在中國學術史上還是中國期刊史上，顧頤剛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既是重要的學術史見證人，又是重要的學術史創造者。

啟示之六：經世致用，學術救國。

在顧頤剛學術生涯中有三件事與三所大學緊密聯繫，並值得大書特書：一是在北京大學倡導古史辨運動，二是在中山大學倡導民俗學研究，三是在燕京大學倡導歷史地理學研究。他從最初抱有“學術至上”的觀念，經“經世致用”的實踐，最終轉變到“學術救國”的學術價值取向。顧頤剛與燕京大學結緣有多種因素，如燕大實行“中國化”、人際關係、從事學術研究的優良環境、待遇豐厚等。據《燕京大學執行委員會會議記錄》（1929年8月1日、2日）記載，執委會表決接受哈佛—燕京學社關於顧頤剛教授任教的報告，報告內容為“哈佛—燕京學社以月薪275美元邀請顧頤剛教授充任該學社研究教授，並以同意他在歷史學系任教不多於3小時為條件”。^③顧頤剛的年薪達到3300美元，與同行相比也是比較高的。“在同一宗檔案中還講到了歷史學系講師張星烺的薪水問題，此時張星烺的年薪為1000美元”，“歷史學系研究生助教朱士嘉的月薪僅有30美元”。^④從1929年6月開始執教，到1937年“七七事變”後離開，顧頤剛前後有8年時間留戀在燕京大學。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熱河失守，華北危機，顧頤剛深感亡國的威脅，“予亦不能自止其敵愾之心，以文字參加抗日工作。”^⑤他參加燕京大學中國教職工抗日會活動，任宣傳幹事；創辦“三戶書社”，取意於“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表達救亡決心，編寫、出版大量鼓詞宣傳抗日；與此同時，他又發起成立禹貢學會創辦《禹貢》半月刊，學會的宗旨明確寫著：“反對‘為學術而學術’，力求把研究地理沿革、民族演進，與發揚光大民族文化的愛國熱情結合起來，使這種研究貫穿經世致用的精神。”^⑥1934年8月，顧頤剛與鄭振鐸、吳文藻、謝冰心、雷潔瓊等專家考察綏遠時，深感“察、綏兩省旦夕有繼東北四省淪亡的危險，心中著急，想喚起國人共同密切注視邊疆問題”。馮家升也指出了研究東北史地的迫切性：“我國學者對於自己的邊疆素少研究，在前清時代和別國起了疆界問題交涉時，已不知吃了多少大虧。民國以來，一旦遇上這類問題，仍是受人欺騙。如東北四省，就歷史上、地理上、法律上說，明明是中國的領土，而日本為了施展領土野心，早幾年前就在國際上宣傳矢野仁一的‘滿蒙非支那論’，可憐我國學者沒有一個能來加以有力反駁。”^⑦由於身處日本侵華加劇、中國出現邊疆危機這一特殊環境，禹貢學會遂把邊疆史地作為這一階段研究的重點，《禹貢》半月刊的內容也由此“轉到了研究邊疆歷史和記錄邊疆現狀為主”。^⑧《禹貢》半月刊共發表研究邊疆史地、邊疆問題文章百餘篇，以對內蒙、東北、西北邊疆的研究為重點，既包括對古代邊疆歷史、民族、地理的文獻考察，又包括對

當時邊疆地區民族分佈、地理現狀、交通運輸、經濟開發、基礎建設等的實地考察，無論新領域的開拓、新方法的使用，還是新成果的產生，都具有拓荒性質。尤其是後者，更體現出經世致用、學術救國的色彩。

顧頡剛十分重視邊疆研究，1936年又組織各方面的專家進行了後套水利和察綏地區兩次實地調查。1937年6月童書業撰寫的《〈禹貢半月刊〉序言》稱：“自從東北四省失陷以來，我們的國家受外侮的凌逼可算到了極點，所以有血氣的人們大家都暫時放棄了純學術的研究而去從事於實際工作。至於留在學術界的人物，也漸漸轉換了研究的方向，即如本刊的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轉趨到邊疆調查，就是這種潮流的明顯的表現。”^⑧從1936年7月1日至1937年2月16日，禹貢學派同仁以問題為中心開展研究，然後集成專號，先後策劃出版《利瑪竇地圖專號》、《西北研究專號》、《東北研究專號》、《後套水利調查專號》、《南洋研究專號》、《康藏專號》、《察綏專號》、《古代地理專號》，力圖從學術視野廓清我國疆土範圍，從而激發國人的自信、自強：“使得荒塞的邊疆日益受本國人的認識和開發，杜絕了野心國的覬覦。我們要把我們的祖先努力開發的土地算一個總賬，合法地承受這份我們國民所應當享有的遺產。”^⑨《禹貢》還率先倡導和支持加強西北回族伊斯蘭教的研究，出版《回教專號》、《回教與回族專號》兩種，並把民族問題上升到關係國家安定、統一的高度來認識。所有這一切，無不反映出顧頡剛強烈的救亡圖存的愛國思想，也彰顯了知識分子在道德良知上的表率性。正由於此，日軍佔領北平後將顧頡剛列入黑名單。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禹貢》半月刊第7卷第10期出版（7月16日）即被迫停刊，顧頡剛與禹貢學會主要成員先後離開北平。禹貢學會在北平的房屋、圖書資料，由於有趙貞信、馮世五、吳豐培等人的守護，得以保全。抗戰勝利後，顧頡剛由重慶飛回北平。1946年3月10日，他在太廟（今勞動人民文化宮）圖書館召開禹貢學會復會會議，參加會議的老、新會員近50人。會議決定，將《禹貢》半月刊改為季刊，由翁獨健負責編輯。季刊未出版之前，先在《國民新報》上闢一個專欄——《禹貢週刊》，由王光瑋、張政烺、侯仁之任編輯。之所以選擇《國民新報》，顧頡剛在發刊詞中明文寫到：“所憾物價奇昂，一時不容印行鉅秩。”《禹貢週刊》出了10期停刊，後又在北平《經世日報》出了16期，終因時局多變、資金無著，徹底停刊。1954年8月顧頡剛就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員後，便與禹貢學會原理事、監事們做出結束學會的決定。1955年2月6日，顧頡剛等將房屋捐獻政府，現金慰勞軍隊，圖書贈送民族學院，刊物分送大學圖書館後，在日記中寫下“禹貢學會從此終了矣”。曲終人散，留下許多回憶，留下許多無奈，也留下許多感慨！

顧頡剛的學識對同代人衝擊很大，流音所在，許多領域都有他的餘響。民國時代因這樣的一批人的存在，變得豐富和神奇起來。他們不僅在舊學裡堅持獨立的思想 and 人格精神，而且在新的學問裡保持思想的自由、開闊的視野。他們在困境中思考學術、人生、社會等問題，給後人留下了許多寶貴的學術遺產。

《禹貢》半月刊停刊已有76年，但其倡導的獨立精神、思想自由、學術爭鳴、兼容並包，至今仍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總結；而顧頡剛在辦刊中堅守的求真精神和人文情懷，更是今天期刊同仁學習和傳承的寶貴財富。

斯人已去，風範長存！

- ①張軍：《民國那些大師·代序》，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 ②孫郁：《在民國·自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
- ③⑩李揚眉：《顧頡剛與傅斯年關係發覆》，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
- ④程文標：《近代史學研究公共領域的形成及其影響》，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 ⑤《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54~55頁。
- ⑥趙吉惠、毛曦：《顧頡剛“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觀的現代意義》，北京：《史學理論研究》，1999年第2期。
- ⑦章清：《民初“思想界”辨析》，北京：《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 ⑧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第1~23頁。
- ⑨張嵩年（申府）：《勸讀雜誌》，北京：《新青年》，第5卷第4號，1918年10月15日，“通信”，第433頁。
- ⑪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載《顧頡剛日記》，第一卷（1913~1926），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1~2頁。
- ⑫⑰葛劍雄：《顧頡剛、譚其驤創辦〈禹貢〉半月刊始末》，濟南：《歷史學家茶座》，2010年第4期。
- ⑬錢穆：《師友憶》，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89頁。
- ⑭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64頁。
- ⑮黃豔林、郝玉香：《論〈禹貢〉半月刊的編輯特色》，福州：《福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 ⑯⑳《紀念辭》，北平：《禹貢》，第7卷第1、2、3

- 合期，1937年4月1日。
- ⑰朱佳木：《顧頡剛先生治學生涯的啟示》，北京：《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4期。
- ⑱喬治忠：《張蔭麟詰難顧頡剛“默證”問題之研判》，開封：《史學月刊》，2013年第8期。
- ⑲《吳宓日記》第8冊，1942年10月26日，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404頁。
- ⑳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2頁。
- ㉑侯仁之：《回憶與希望》，上海：《歷史地理》，1981年創刊號。
- ㉒《發刊詞》，北平：《禹貢》，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1日。
- ㉓Minutes of the General Faculty Executive Committee, August 1st and 2nd, 1929, 北京：北京大學檔案 YJ1929011。
- ㉔丁超：《燕京大學時期顧頡剛的學術事業與禹貢學會》，曲阜：《齊魯學刊》，2010年第6期。
- ㉕顧頡剛：《〈史林雜識〉小引》，載《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2頁。
- ㉖韓儒林：《回憶禹貢學會》，上海：《歷史地理》，第2輯，1982年。
- ㉗馮家升：《我的研究東北史地的計劃》，北平：《禹貢》，第1卷第10期，1934年7月16日。
- ㉘顧頡剛：《文革交代〈禹貢學會簡史〉》，引自顧潮：《顧頡剛年譜》，1934年8月8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223頁。
- ㉙童書業：《〈禹貢半月刊〉序言》，北平：《禹貢》，第7卷第6、7合期，1937年6月。
- ㉚《本會三年來工作略述》，北平：《禹貢》，第7卷1、2、3卷合期，1937年4月1日。

作者簡介：張耀銘，《新華文摘》原總編輯、編審，南開大學兼職教授。北京 100706

〔責任編輯 劉澤生〕